

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所藏日偽《敵方廣播新聞紀要》

王文隆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

今年適逢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，為了響應此一值得紀念的年度，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開放在抗戰期間，由中國國民黨黨部人員截聽、抄錄日偽廣播或是電報之《敵方廣播新聞紀要》，時間起自1938年，終於1940年。

《敵方廣播新聞紀要》，手寫油印，限量發行，內容全屬機密，在每冊封底都有注意事項，特別敘明紀要內容全為敵方宣傳，編輯分送是為了軍政領袖參考，絕非新聞報導，並訂有三項公約：

- (1) 接得紀要後要審慎保藏，或隨閱隨燬，以免流傳；
- (2) 紀要專供收受者參考，絕對弗任傳觀；
- (3) 紀要所載消息均含敵方宣傳毒性，千萬要加以抹除，勿引為談話資料。

負責編輯《敵方廣播新聞紀要》的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（以下簡稱：中央宣傳部）。中央宣傳部是中國國民黨於1924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時成立的一級單位，由戴季陶擔任首任部長，劉蘆隱擔任秘書。（註1）成立之初的編制不大，主要功能在於傳播黨中央的消息。1927年宣傳部擬定「中國國民黨宣傳方略」，做為指導宣傳工作的基礎教本，此後宣傳部的功能逐漸擴大，除中央通訊社及管轄原屬黨報，如《中央日報》、《民國日報》等報刊之外，也旁涉廣播電台的設置，如中央廣播

電台等，用以發施政令、宣揚主義。(註2)

1928年3月，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二屆第123次中常會，會中通過「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組織條例」，將工作細分為普通宣傳、特種宣傳、國際宣傳、徵審、出版和總務六科。(註3)抗戰爆發之後，為探知日本方面的情報，向海外發布中國實情，與日本利用英文推展的國際宣傳相抗，先於1937年11月成立國際宣傳處，由曾虛白擔任首任處長，後於1938年2月將軍事委員會負責檢查外電的第五部，歸併至中央宣傳部，調任第五部副部長董顯光為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國際宣傳處處長。(註4)其中，國際宣傳部第三科負責對敵宣傳工作，又被稱為對敵科，由董顯光延攬熟稔日本事務的青年黨黨人崔萬秋擔任科長，工作項目包括蒐錄敵方廣播、分析敵方情報，以及對日的中國之聲(The Voice of China)廣播。(註5)參與第三科的工作人員，不乏臺籍菁英，如新竹出身、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蘇維霖，便曾經參與該科工作。(註6)

為能知己知彼，熟悉敵方宣傳脈絡，第三科所蒐羅的敵方廣播資料，除作內部參考之外，亦匯集成冊，如搜知內容有較為重要者，便循管道上報。黨史館所藏的《敵方廣播新聞紀要》，從重慶版的第1輯至第407輯，時間起自1938年12月7日至1940年1月17日止，每日一報。此為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掌握敵情、關注敵方宣傳情況的利器，也能從此窺探日方在戰爭期間所釋放

出來的訊息，進而規劃在宣傳上如何應對的重要素材。因為是監聽敵方廣播或是截聽電報彙整為紀要，每冊出刊時間為每日上午8時起，涵蓋的時間自該紀要出刊前兩天的11時起，至該紀要出刊前一天的11時止，共24小時的廣播內容，截聽廣播發話源以東京、大連為主，抄錄時還附上播放時間，大致分為重要消息、軍事消息、政治消息、敵方消息、國際消息與雜訊等不同大類，但不盡然都會出現，偶爾也會搭配其他專題。軍事消息多為日軍軍事行動，或是日方對我軍行動的描述；政治消息指的是日方對我國政治情況的報導；敵方消息則是日本國內政情局勢；國際消息則多指德、義、英、美諸國與日本相關的訊息。此外，也間或出現位於北平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、位於南京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，以及滿洲國與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的廣播。茲舉幾個例子：

(一) 日本登陸海南島、占領海口(1939年2月)

1939年1月，日本以空軍為前導，搭配海軍與陸軍登陸海南島。紀要所蒐錄的報導，抄錄了日軍各項進攻的細節之外，也將日本天皇對發起戰爭之日軍所做的談話，做了簡單的抄錄。另外，在抄錄的相關報導中也有粗略的分析，提及日軍占領海南島，能干擾中華民國經越南轉運物資的路徑，並能利用海口的機場裝配空軍，縮短發動空襲的距離，封鎖中華民國在華南的交通動線，另

外也以海路威脅香港，擾亂援助中華民國物資經港轉口的安全。就紀要所抄錄的訊息來看，日本官方透過廣播想要傳遞給一般百姓的訊息，算是頗為詳盡，不僅政府官員上電台發聲，也會有軍方的高級官員上電台向民眾說明，甚至能分析國際局勢，確實有全民參與之「總體戰」的氣氛，另也向聽眾交代日軍在占領海口後的宣撫工作及其內容。

（二）程錫庚刺殺案與英日交涉（1939年4月）

1939年4月9日夜裡，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聯合準備銀行經理兼津海關監督的程錫庚，（註7）偕其妻子到天津英租界的大光明戲院看有聲電影。當劇中正上演槍戰場面時，刺客舉槍朝向程錫庚。程錫庚當場斃命，刺客逃逸無蹤。（註8）程錫庚，字蓮士，江蘇鎮江人，1919年獲得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博士學位，以學人之姿回國之後，進入外交體系。（註9）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便投入王克敏之下，其妻為高而謙（註10）幼女，與北洋外交體系的淵源不可謂之不深。（註11）

程錫庚死於天津英租界，疑犯遭英國工部局逮捕，這就引發了英日間圍繞著管轄權的爭論。對重慶國民政府來說，疑犯刺殺之舉是鋤奸，自該營救；但對日本與臨時政府來說，租界成了窩藏重慶國民政府所派間諜能藏身的孔隙。依照法理，該租界是由國民政府為地主，如工部局逮捕人犯，應該押解重慶，然而因天津英租界早被敵偽包圍，

英國為求租界安全，不得不屈從於日軍的壓力，將疑犯送交日軍處理。這一些相關的接觸與報導，也能在《敵方廣播新聞紀要》中看到。

（三）崑崙關大捷（1939年12月）

崑崙關戰役是桂南戰役的一環，因崑崙關位於南寧周邊，是物資自法屬印度支那輸入中華民國的孔道之一，因此為日軍所攻略。在《敵方廣播新聞紀要》中也收錄了日方對桂系將領的談話，刻意切割蔣中正與桂系間的關係，號召桂系將領參加和平運動。但在國軍奪回崑崙關前後，相關日方的廣播與報導卻出現得相當少，節錄的部分反而多以長江下游開放、日軍進攻廣東省北部、中條山戰役等內容為主，幾乎沒有桂南戰役的相關新聞。或許能從中見的日方廣播中也有隱惡揚善的部分，也或許這是我方在資訊篩選上的刻意安排。

除以上舉隅之外，《敵方廣播新聞紀要》中也能見到空襲、華僑、占領區民眾的相關報導，如蘭州空戰的相關紀錄、江亢虎被接運至神戶、占領區人民組織團體或舉行慶祝活動等消息，除提供蛛絲馬跡，按圖索驥外，也能將宣傳的內容與實際情況做比對。此外，還有一些日方在經費上的預算與安排，也都能在《敵方廣播新聞紀要》中找到。

需要留意的是，因《敵方廣播新聞紀要》是節錄敵方廣播、電報內容而來，因

此在廣播內容中所提的「我政府」、「我軍」，指的並不是重慶國民政府及其所轄國軍，而是指日本政府與日軍，「敵軍」反而是指中華民國國軍。但為求閱讀時方便，在標題上，日方一律被稱為「倭」、「敵」或「寇」，而「我」字在標題中所指的卻是重慶國民政府。標題與內文在指涉對象時，有敵我的不同，這是在利用該批史料時必須注意的。

《敵方廣播新聞紀要》的公開，能使學者對於 1938 年至 1940 年間，在汪精衛政權正式成立之前，日偽政權對外發布的廣播消息，能有進一步的了解跟認識，這對日偽當時如何看待侵華戰爭、如何看待國際大勢，以及篩選資訊傳遞、官方宣傳內容等，能有進一步的認識。

【注釋】

1. 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》第 18 號，廣州 1924 年印本，頁 61-63。
2. 高郁雅，《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政局變動（1945~1949）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03 年），頁 18-19。
3. 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屆第 123 次會議紀錄」（1928 年 3 月 22 日），《會議紀錄》，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，檔案號：會 2.3/67.1。
4. 董顯光著，曾虛白譯，《董顯光自傳：報人、外交家與傳道者的傳奇》（臺北：獨立作家，2010 年），頁 116-120。
5. 陳正茂，《醒獅精神：青年黨人物群像》（臺北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2008 年），頁 232。
6. 蘇明陽、李文卿編，《蘇維熊文集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0 年），頁 279-280。
7. 程錫庚似乎又名程錫康，當時日人所編之人名辭典，皆作「陳錫康」。
8. 〈津除一巨奸：程逆錫庚死于影院〉，《大公報（重慶）》（1939 年 4 月 12 日），第一張第二版。
9. 溫源寧，《一知半解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88 年），頁 61-62。
10. 高而謙，字子益，福建長樂人。幼時由船政學堂資送留法，舉人出身。曾任外務部右丞、雲南臨安開廣道、雲南交涉使、堪界大臣、外務部左丞、四川布政使、駐義公使、外交次長等職。詳見：外交部檔案資訊處（編），《中國外交機關歷任首長銜名年表（增訂本）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88 年），頁 96。
11. 外務省情報部（編），《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年鑑（昭和十二年版）》（東京：東亞同文會業務部，1937 年），頁 404；大陸文化研究所編，《現代支那人名辭典》（東京：泰山房，1939 年），頁 314。